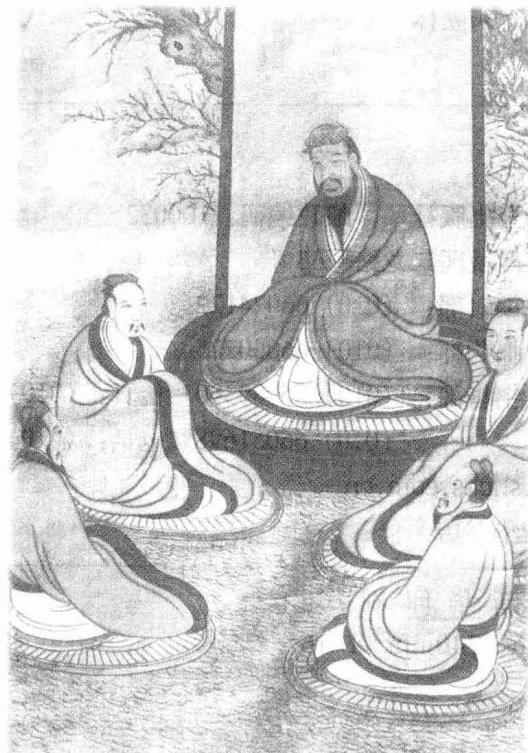


济宁历史文化丛书⑳

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委员会 编
编纂委员会主任 赵树国

孔子弟子评传

杨朝明 宋立林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序

济宁图

经过多方面的不懈努力，《济宁历史文化丛书》陆续面世了。这是济宁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历史文化丛书，是我市文化建设的重要收获。这部丛书的出版，值得祝贺。

济宁是孔孟之乡，在中国文化版图和世界文化格局中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因孔子、孟子而享誉天下，又因历史悠久、文化繁盛而成为中华文化的缩影。济宁东依泰沂山脉，西接中原平地，古泗河流贯全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一区域是上古东夷族聚居的地区，曾是我国传统文化最稠密、最领先的地区，历史上有过三次大的文化辉煌期：第一次是七千年前至五千年前的伏羲氏、女娲氏、炎帝、黄帝、少昊帝一脉相承的东夷文化高峰。龙、凤图腾的肇始是其灿烂的文化标志。第二次是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邾娄文化和鲁国文化，并由此造就了主导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孔子、孟子及其儒家学说。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深深地渗透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最深刻、最完整、最普及、凝聚力最强的思想体系。今天，儒家学说以其独特的内蕴仍被世界许多国家重视、研究和开掘。第三次是明清两朝的大运河文化。济宁运河文化融南北，集

漕运、商贸、手工业和农产品加工、农业商品化的影响于一体，吸纳了吴越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和燕赵文化的精髓，融合了秦晋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特色，呈现出广泛的兼容性、多元性和开放性。在这块文化沃土上，还产生了史传千载的梁祝文化，忠义刚烈的水浒文化，华彩无边的才子文化，流艺无声的匠圣文化。在济宁，“雅”文化与“俗”文化并存，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并存，“武”文化与“文”文化并存，山文化与水文化并存，儒、释、道并存，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风姿，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厚德载物”的精髓。

当今时代，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国家和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支撑因素。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命题，省委、省政府作出建设经济文化强省的重大部署，文化发展面临着新机遇、肩负着新使命。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自觉，努力塑造济宁文化的魅力和特色，使文化成为展示济宁形象的品牌和标识。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提出了“建设文化繁荣新济宁，努力实现由文化资源大市向文化名市跨越”的目标任务。济宁厚重的历史文化基础是我们建设文化名市的独特优势和根基。加强传统文化的挖掘、研究和宣传，形成儒家文化发源地所特有的优秀传统文化氛围，使济宁成为重要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基地，是文化名市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济宁历史文化丛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济宁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整理和挖掘，是展示济宁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

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乡土教材，是中外客人了解孔孟之乡的权威“导游员”。

当前，世界范围内正蓬勃兴起“孔子热”“汉语热”“中华传统文化热”，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越来越得到广泛的关注与推崇，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济宁作为传统文化最富集、最厚重的地区之一，完全应当有信心、有条件在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上有更大作为。世界因为文化而了解孔孟之乡，孔孟之乡也只有通过文化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希望有志于文化建设的社会各界人士，以更大的热情、更加卓有成效的工作，积极投身于文化事业，为文化名市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09年1月

(作者为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作序时任中共济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目 录】

序

总论	1
1.孔子施教与孔子弟子	4
2.孔子弟子的历史地位	13
3.孔子弟子的分化	30
4.时代需要一部新评传	44
分传	49
1.颜子	50
2.曾子	92
3.闵子骞	126
4.冉伯牛	137
5.仲弓	142
6.冉有	161
7.子路	171
8.宰我	186
9.子贡	197
10.子游	218
11.子夏	234

12. 子张	265
13. 有子	289
14. 漆雕开	298
15. 濂台子羽	322
16. 子羔	329
17. 宓子贱	336
18. 巫马期	342
19. 公西华	344
20. 原思	346
21. 公冶长	355
22. 南容	358
23. 公皙季次	361
24. 颜路	363
25. 曾皙	366
26. 商瞿子木	369
27. 司马牛	371
28. 樊迟	374
附录	379
孔子弟子总表	379
参考文献	393
后记	404

“以昭我武，曾宥我室。曾孙于逝，曷不以时？”《采薇》是先秦本末之诗，也是《诗经》中最早的一首诗，它唱出了古人的忧患意识和对未来的希望。

总 论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中孔子对《诗经》的评价，就是对《诗经》的最高评价。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典籍，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共收录了305首诗，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有160首，雅有105首，颂有40首。《诗经》中的诗，都是由当时的人民创作出来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

《诗经》中的诗，都是由当时的人民创作出来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诗经》中的诗，都是由当时的人民创作出来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

《诗经》中的诗，都是由当时的人民创作出来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诗经》中的诗，都是由当时的人民创作出来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

《诗经》中的诗，都是由当时的人民创作出来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诗经》中的诗，都是由当时的人民创作出来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

《诗经》中的诗，都是由当时的人民创作出来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诗经》中的诗，都是由当时的人民创作出来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

“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地来？”^①台湾一位历史学家曾如是感叹。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有趣现象！不论古今中外，往往都有这番瑰丽的文化景色！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无疑是天才集体涌现于历史舞台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情形也并不罕见，春秋战国之际就是中国文化史上天才涌现的伟大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有人称是中华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这个时代不仅诞生了孔子和老子这样的思想巨人，如同日月光照千古，而且有管仲、孙武、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一大批声名显赫的思想家！中国思想的天空群星闪耀！

在这群星灿烂的时代，有一个当时极为重要、日后似乎为人所忽视的特殊群体，那就是孔子的弟子们。孔子弟子数目庞大，有三千之众，被记录下来的就有七十余位，正所谓“孔门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这些孔子弟子又被称为“七十子”。他们与孔子共同组成了一个学术门派，对后世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当我们怀着敬畏之心走进孔庙的时候，我们会在大成殿中发现他们的身影：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还有位列十二哲的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子路、冉有、子贡、宰我、子夏、子游、子张、有若，在殿前的东、西两庑之中，许多先贤被供奉其中。他们在古代近两千年中备受尊荣的礼遇，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回忆。试想，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孔子将不会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孔子，中国儒学也不会有后世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甚至很难想象一部中国思想文化史将会以何等面目呈现于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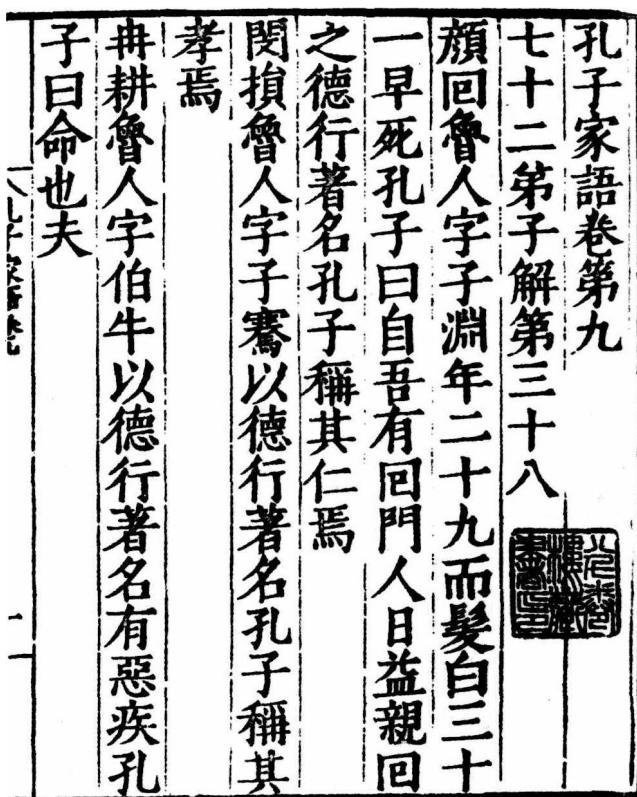
事实上，“七十子”已经成了被人忘却、被人忽略的一个儒家圣贤群体！

如果将时光倒退回 2500 年前的春秋战国之际，去一睹孔子弟子群体的

^①王汎森：天才为何成群地来，《南方周末》2008年12月3日。

风姿，定会让今天的我们由衷地感叹、惊奇：天才真是成群地来啊！

孔子弟子，史籍上有的称为“七十子”，有时泛称“孔门弟子”。“孔门”一词首先出现于汉代王充的《论衡·问孔》篇中，特指由孔子和他的及门弟子组成的学术群体。在春秋战国之际百余年的时间里，这个群体曾经那样意气风发，曾经那样引人瞩目。他们围绕在孔夫子的周围，众星捧月一般，闪耀着思想与人格的光辉。孔子去世后，他们散游四方，传播孔子之学，弘扬儒家之道。他们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使儒门事业得以发扬光大，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奠定了孔子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



《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

【 1. 孔子施教与孔子弟子 】

如果在中国历史上找一个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最大的人物，自然非孔子莫属！除了整理六经，创立儒学之外，孔子另一项重要的历史功绩应当就是开创私学传统，培养了大批的弟子。孔子开办私学，无论是办学规模和教学特色，在历史上都具有突出的地位，对后世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孔子之前，古代教育已经十分发达，也因此保证了三代时期的文化发展与文明进步。然而，三代时期的教育总体上是“学在官府”，而孔子开创了私学传统，使得“学术下移”，显然别具价值。首先，这使得教与学二者作为一种文明行为进入了自觉的阶段，并发展出一套教育思想；其次，私学的出现使“学而优则仕”成为可能，也因之打破了“血而优则仕”的贵族世袭制传统，极大地刺激了社会的开放和流动，促进了士人作为一个阶层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与当时的社会变革和发展节拍正相吻合，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推动了文化的繁荣、政治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孔子所从事的教育活动，在中国教育史乃至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也许孔子从来没有自期做一个教书匠，成为一位教育家，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孔子的教育实践促成了孔子思想的发展和提升。他的学说的酝酿、发展、定型，都是在与学生的交流、对话乃至辩论过程中实现的。

孔子的理想在于淑世救世。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天下无道。而“天下无道”的表现就是“礼坏乐崩”。孔子希望能够以礼乐秩序的重建来实现天下有道的理想，为此，他孜孜以求，黾勉从事，他以《诗》、《书》、《礼》、《乐》为教授内容，倡言仁义，厉行道德。大概从三十多岁起，孔子就开始收徒授学，不少人登门请教，成为孔子弟子。随着孔子的声名日

益远播，孔门规模越来越大，“弟子弥众，至自远方”（《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十五岁时而“志于学”。这里的“志于学”其实就是“志于道”，矢志于学问，希冀从中为人间寻得一种“道”，以安济天下。他奋发求“道”，勤奋好学，积极进取，他的“好学”精神促使他“学无常师”，也使他深刻地认识了历史与现实，具有了广博而非凡的学识。孔子立志拯救社会，希望建立礼乐大行、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为推行自己的主张，寻求同道者，培养德才兼备的新君子，孔子适应时代潮流，创办私学，开课授徒。

孔子开办的私学在当时可能不是唯一的，但肯定是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也是最为成功的。孔子的教学方式灵活多样，明显不同于之前的官学。随着其办学规模的扩大和声誉的提高，其教学活动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孔子弟子众多，《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自己也说，“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孔子办学“有教无类”。他以博大的胸襟和超人的勇气，打破了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将私学的大门向所有向学的人敞开，不分贵贱、无论贫富，人人都可以入学接受教育，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平民，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孔子弟子来自许多诸侯国：他们中的多数来自鲁国，也有的来自齐、宋、卫、秦、晋、陈、蔡、吴、楚等国，分布地区广；他们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大多数出身平民，也有出身商人或贵族的；他们品类不齐，秉性天赋各异，大多数人都注重德行的修养，但又各有特点；他们的年龄差别更大，虽都比孔子小，但最大者只少孔子四岁，最小者要少孔子五十多岁。孔子开门办学，方法灵活，方式多样，弟子来去自由，“欲来者不距（拒），欲去者不止”，以至于有人认为“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对此，子贡认为是“君子正身以俟”的结果，他认为，这种情况正如“良医之门多病人，驩栝之侧多枉木”（《荀子·法行》）。

关于孔子收徒授学的情况，孔子曾经自谓：“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也。”（《论语·述而》）所谓“束脩”，历来有两种解释：一是“束发脩饰”的意思，指十五岁以上的年轻人；一是“十条干肉”，指古代用来作初次拜见时的礼物。这里很可能是指前者而言。东汉经学家郑玄在为《论语》作注时说：“束脩，谓年十五以上也。”古代男女成年以后，把头发扎成一个结，盘在头顶上，开始讲究脩饰，表示即将成年，叫作“束脩”。据《汉书》记载，有人说：“且吾自束脩以来，为人臣不陷于不忠，为人子不陷于不孝。”章怀太子李贤注曰：“束脩，谓束带脩饰也。”可见在汉唐时期这种用法依然流行。孔子这里的话表示收徒授学“有教无类”，应该是仅仅表示的年龄因素，而不是所谓的“一束干肉”。即便此处束脩是指“干肉”而言，很显然孔子注重的也一定仅是一种“拜师”之“礼”，而不会像通常人们理解的“收取学费”。

孔子显然意识到，社会的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要想改造社会，最根

本的就是使社会中的人得到改造。而教育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因此，孔子招收弟子，目的是通过自己的教育活动，对这些青年人施加以影响，以礼乐的素养、仁义的德行等来改造或型塑出一大批“成人”来。孔子的弟子子路曾经向孔子问询怎么样才算是完美的人，孔子回答：“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孔子认为只有智勇双全，多才多艺，礼乐仁德修养深厚的人，才称得上是“成人”，即完美的人。孔子又感叹“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现在这样的人已经看不到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在哪方面突出也可称得上是完美无缺的人了。孔子又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子路是孔子早期的弟子，师徒间的谈论是有针对性的，这成为师徒追求的共同目标。由此得知，孔子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成人”，即培养完美的人才，至少是某一方面突出的人才。

使人成为人，这是教育的本质所在。而所要成为的“人”，是通过文化的熏染和提升，脱离了动物性的人，是有知识素养、德性涵养的君子。只有这些君子之才进入政治，进而得以影响政治，引领社会，才能实现改造社会、实现“天下有道”的理想。

孔子的学生复杂，孔子却能够成功地教之成才，体现了孔子教育思想的博大和教学艺术的高明。孔子明确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认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认识到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孔子认为教化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繁盛同样重要，他提出了著名的“庶—富—教”的主张，认为国家人口繁盛之后要使百姓富裕，然后还要进一步施以教化。

孔子弟子受教于孔门，时间地点并不固定。多数时候，是以游学的形式进行的。孔子讲学，或弦歌于“杏坛之上”，或习礼于“大树之下”，或在颠沛流离的“周游”途中。孔子授徒讲学后，无论是从政出仕，周游列国，还是归鲁后整理文献，均有弟子陪侍追随，聆听教诲。尤其是周游途中，主要弟子追随左右，师生患难与共，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仍然讲诵、习礼不止。

而孔子弟子之所以能够大放异彩，成为一道独特的思想风景线，这与孔子的教学方式密不可分。朱熹曾说：“孔子教人，各因其材。”（《论语集注》）此即后人所说的“因材施教”。孔子认为人的智力各有差异，兴趣互有相同，教育必须要有针对性，才能取得好的效果。他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因材施教”的广泛运用，必须以了解学生为基础。

孔子对弟子的个性特征了然于心，从《论语》的记载看，孔子评价弟子，往往能够精练准确地刻画出弟子形象。基于此，孔子才能区分对待不同特性的弟子，对他们施以不同的教诲。如子路和冉有问“闻斯行诸”，弟子们“问政”、“问仁”，孔子的回答往往各不相同，都针对弟子不同的个性区别对待，循循善诱地加以引导，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教学中，孔子还提倡运用举一反三、启发诱导、循序渐进等教学手段引导学生，使弟子了解自己所传授的知识和思想，主张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以达到自己的教育目的。孔子教导弟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要学思并重，思学结合。因此对于好学、善学的颜子，孔子总是赞赏有加，对他的早逝痛心疾首。

孔子所培养的学生，从来不是只知道“皓首穷经”的书生，而是知行合一的君子。因此参加政治外交则是不可缺少的实践。孔子注重实践行动，提倡君子应当“敏于行”，这也是他对弟子们的要求。他鼓励弟子参加政治实践，曾推荐子贡、公西华等担任使节，推荐弟子到全国各地任职。弟子们在赴任前，不少人都向孔子“问政”，以在实践中能最大限度地推行孔子的政治主张。如仲弓为季氏宰，孔子告诫他要“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子夏为莒父宰，孔子教育他：“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对于弟子们的从政成果，孔子也予以检验，给以评价。如冉求替季氏敛聚财富，违背了孔子藏富于民的主张，遭到了孔子

的斥责：“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子游为武城宰，用礼乐教化百姓，孔子高兴地鼓励其他弟子向其学习。

孔子弟子的政事课程丰富多彩，既有热烈的理论探讨，又有丰硕的实践成果。曾经向孔子请教相关从政问题的学生很多，仅《论语》的记载就有：“子张学干禄”（《为政》）、“子张问政”（《颜渊》）、“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尧曰》）、“子路问政”（《子路》）、“子路问事君”（《宪问》）、“子贡问政”（《颜渊》）、“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路》）、“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路》）、“颜渊问为邦”（《卫灵公》）等等。古籍记载中，孔子有十一位弟子在不同的国家担任过不同的职务，如子路在鲁国曾任“季氏宰”，到卫任“蒲大夫”；高柴曾任鲁国“费宰”，到卫国后任“士师”，回鲁后再任“武城宰”和“郕宰”；子贡则“常相卫、鲁”等。

孔子名声远播，连远在南方的楚国君臣也对孔子弟子的情况十分熟悉，对他们的从政能力和特点耳熟能详。《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楚令尹子西谏楚昭王的一段话：“‘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可见孔门弟子在诸侯国中的影响。

孔子教学成功的关键不仅是言传，更重要的在于身教。孔子深深地明白以身作则在教学和从政中的作用。他认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平时严格要求自己，他的勤奋好学及为实现理想而孜孜追求的精神，形成巨大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着学生。

弟子们崇拜和敬仰老师，从而培养出既严格又融洽的师生关系。

孔子的思想学说不容于当世，不被人们普遍接受，他本人也常受到误解、诽谤甚至攻击。为了捍卫孔子的威望，宣传孔子思想，孔子弟子们奋起反击，竭力维护孔子形象，他们以自己对孔子的理解，阐述孔子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学说。例如孔子曾说：“自吾得由也，恶言不至于门。”（《孔丛子·论书》）孔子的弟子仲由（子路）极力维护孔子，对孔子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

史料记载中，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是子贡。每当孔子受到误解和诽谤，子贡总是出来维护孔子的形象，对孔子的敬重溢于言表。《论语·子张》中集中地记录了这方面的内容，如：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官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宫室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宫室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也，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韩诗外传》卷八的有一段记载更为详细：

齐景公谓子贡曰：“先生何师？”对曰：“鲁仲尼。”曰：“仲尼贤乎？”曰：“圣人也，岂直贤哉！”景公嘻而笑曰：“其圣何如？”

子贡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圣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贡曰：“臣终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犹渴操壶杓，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誉，得无太甚乎？”子贡曰：“臣赐何敢甚言，尚虑不足耳。臣誉仲尼，譬犹两手捧土而附泰山，其无益亦明矣。使臣不誉仲尼，譬犹两手把泰山，无损亦明矣。”景公曰：“善！岂其然？善！岂其然？”

面对人们对孔子的误解乃至攻击，子贡毫不留情，称这种行为是“欲自绝”、“不知量”，他把孔子比作日月、天地、江海、泰山，孔子学说如日月之光明、天地之高厚、江海之深广、泰山之峻伟，他认为别人永远只能仰望孔子，而不可能达到孔子的水平。子贡由衷地敬佩孔子，仰慕他的学说，他对孔子的评价既维护了孔子的形象，又宣传了孔子的学说。

孔子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具有德行和能力的政治人才，因此其教学内容自然与此前的周代贵族教育有不少一致之处，但它与周代官学又有很大的区别。他要培养的是德才兼备的弘道之人，因此孔门教学内容主要是文、行、忠、信。孔子还整理过《诗》、《书》、《礼》、《乐》等历史文献，又“作《春秋》”、“赞《易》”，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本。

孔子学无常师，信奉“三人行，必有我师”，因此弟子在某一方面有长处，孔子也虚心学习。而对于学生，他提出应该“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提倡弟子与老师互相启发。基于这种认识，孔门中形成了相互爱护、亦师亦友的和谐关系。孔子与弟子虽然是师徒关系，但经常讨论问题，弟子们可以畅所欲言。对弟子发表的见解，孔子也常常予以鼓励，而对于有见识的言论更是赞赏有加，如表扬子夏：“起予者，商也。”（《论语·八佾》）认为子夏的见解对自己有重要启发。

在原则问题上，孔子对弟子是十分严格的。但这种严格的背后是孔子发